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从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看“三三制”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是毛泽东1941年11月6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会上的讲话，最早公开发表于22日出版的《解放日报》，之后相继在《新华日报》《晋察冀日报》刊载。新中国成立后，该讲话被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要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目的下，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坚决实行“三三制”原则。

深刻阐述“三三制” 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会在延安举行。7日，《解放日报》刊载文章《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再现了会议当天的盛况。“各参议员来宾入场后，彼此见面，握手言欢，着毡帽长袍之银髯耆绅；包头布留发辫的老年农民；着短服之工人士兵；蓄发髻的农村妇女；名流、学者、各民族、党派、阶层团体职业之人民参议员齐集一堂，态度诚恳，情绪热烈，会场内充满感奋的空气”。会议开始后，林伯渠、朱德相继发表讲话。“这时毛泽东同志乘车莅场，立时掌声雷动，会场空气更为振奋，毛泽东同志身着灰色军装入场后全场参议员来宾颔首为礼，后被请登台讲话。毛泽东申述参议会开会之唯一目的，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三民主义”。

22日，《解放日报》头版全文发表《毛泽东同志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深刻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政策和“三三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三制”政策及其他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人民的，顾及一切阶级，而特别是顾及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三三制”政策，是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的政策，是真正三民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我们希望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不但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并且在全国也实行起来”。

“三三制”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时采取的政策，即政权机关（包括参议会和政府）的人员构成中，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人士大体各占三分之一，由人民选举产生，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毛泽东早在1940年便已提出“三三制”，其提出最重要的历史背景是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需要。

面对华北事变后国内外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毛泽东于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其中明确指出：“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为渡过难关，进一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抗日阶级和阶层，充分发挥全国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坚持抗战到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共中央提出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三三制”原则。

1940年3月6日，由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人员构成上实行“三三制”，这是“三三制”首次被明确提出。“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7月5日，毛泽东为纪念抗战3周年而作的《团结到底》一文在《新中华报》发表，首次面向全国人民公开提出建立“三三制”的主张。文中写道：“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

12月25日，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阐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论政策》的党内指示。指示强调，关于政权组织，必须坚决实行“三三制”原则。“切忌我党包办一切。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三三制”的实行，从制度上为党外人士进入政权并占有一定比例提供了保障。这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各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参与抗战，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全面实行“三三制” 成为新民主主义建设模范

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把陕甘宁边区建成模范“试验区”，对边区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做了大量指导工作。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边区政府组成人员，讨论并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共3章28条。纲领明确规定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性质、特点和基本政治、经济政策，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主义制度。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边区的建设方向是要成为“抗战的堡垒”和“民主的模范”，同时提出1939年边区的施政方针。朱德评价说：“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

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该纲领的重要内容大部分是由毛泽东审阅初稿时重新改写，共21条。纲领明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并对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作了具体政策规定，特别是规定边区参议会实行“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这是第一次以“法”的形式将“三三制”原则确定下来。此外，纲领还提出要将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军民一致、军政团结、政治民主、经济上有办法的对全国有示范作用的先进地区。

“三三制”原则提出后，边区的许多干部思想不通，担心实行该原则“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失去“流血牺牲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的政权”。针对此情形，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开展一些说服工作。

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会上有针对性地阐述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原则和意义。他强调“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毛泽东号召参议员中的共产党员要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听人民的意见，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共同把国事办好”。毛泽东的讲话，在社会各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同时也成为本次大会的指导思想。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的成功召开，最显著特点是选出了真正的“三三制”民主政府，建立起“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在这次会议中，为改变第一届边区会议选出的边区政府负责人全部是共产党员的情况，毛泽东提议：“这次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时，两个副主席中要有一个是由非党的进步人士充当。”根据该原则，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绥德县开明绅士安文钦为副议长，米脂县开明绅士李鼎铭为副主席。在选出的18位边区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有7人，超过了“三三制”规定人数，共产党员徐特立马上申请退出。之后，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使得非党员人数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如此一来，便完全符合了“三三制”原则。

毛泽东的真诚态度，深深感动了许多中间人士。会议第二天，李鼎铭对大家讲：“昨天毛先生讲的几句话，真教我五体投地。他说我们的施政纲领与‘三三制’，下面工作的人，还做得不够，他们仍旧拿一种闭门主义，不肯信任别人，把持包办，一意孤行。我想毛先生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竟然把下面情形说得这样清楚，说得这样透彻，真是绝顶聪明。”之后，李鼎铭在就职演说中表示，共产党“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应“互相信任，互相亲爱”，“看成一家人，通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

参议会在讨论边区政府提出的1942年度财政预算时，李鼎铭等11位民主人士联名提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议案，同时提出5项具体实施建议。该议案提出后，受到大会的高度重视，以绝对多数票获得大会通过，并“交政府速办”。毛泽东看到该提案后也非常重视，他将整个提案抄到本子上，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精兵简政、发展经济的指示，号召普遍推行。毛泽东后来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对其他抗日根据地产生了巨大的示范作用。彭德怀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回到延安后，曾评价说：“这个边区给全国，给敌后做了很多事情，把革命的三民主义，也是新民主主义在陕甘宁边区认真实现了，对全国来说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因为这是国民党人几十年讲要实现的三民主义，而实际上没有做。对敌后所有解放区亦有很大的帮助，这里的许多经验介绍给敌后解放区，使他们的民主建设得到更快的、更顺利的进行，对坚持战争准备反攻有好处。”

“三三制”的有效实施，使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对此，毛泽东自豪地说：“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这也是新中国面向世界的形象。” **（据《中国档案报》）**

五四运动对银川的影响（下）

应驻宁国民军联军党组织的要求，李临铭、贺维新、马思然、陶振亚、郭维华5名中共党员和一些进步青年留在宁夏工作。这些留下来的中共党员与驻宁国民军联军宣传队及中山日报社马云堃、贾一中等人，在银川共同建立了宁夏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李临铭任书记，马云堃负责常务工作，贾一中负责共青团工作，办公地点设在鼓楼。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的建立是宁夏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此，宁夏的革命事业有了主心骨。

增强信心，为银川开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提供精神动力

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五四精神，为银川青年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通过五四运动，中国青年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现了自己的力量。生于斯、长于斯、学于斯的宁夏青年学子也从五四爱国青年身上汲取了力量，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力量。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宁夏成立“沪案后援会”，五中八师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声援上海工人的反日爱国斗争，在银川掀起反帝爱国斗争的高潮。1930年春，宁夏旅平学生会正式成立，成员为宁夏籍在北平求学学生。宁夏旅平学生会以“联络同学，增进感情，宣传科学，反对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推动宁夏的社会进步”为宗旨，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出版《银光》进步刊物，向银川各机关职员、学校师生及地方进步绅士发放，反映宁夏社会问题，引起银川一些学生和进步人士的共鸣，成为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宁夏旅平学生会中的张子华、孙殿才等人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开展了许多有益的革命活动。1930年，面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局面，加之宁夏中学出现发放助学金不公现象，宁夏中学的一些进步学生公开提出“驱逐绅士徐宗孺”“拥护杜立亭当校长”等口号。宁夏当局派军警抓捕进步青年，杜润滋、邬逸民等中共党员与进步教师联合起来，发动学生上街游行、散发传单，揭露军警逮捕学生的行径，最后形成了罢课、闹学潮活动，史称“宁中学潮”。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宁夏当局被迫免去徐宗孺校长职务，委任杜立亭为校长，释放了被捕学生，使学校的领导权掌握在进步教师手中，为党的秘密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中共党员张子华动员在北平的宁夏籍学生先后参加抗日同盟军。1935年，北平爆发大规模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宁夏旅平学生会积极投身其中，联合甘肃、青海学生，组织“西北公学游行队”，为抗日救亡奔走。可以说，五四运动为以青年学子为主体的银川人民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加速了银川人民的觉醒。一些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奉献力量，甚至献出宝贵生命。 **（据银川党史网）**

解放前吴忠地区的商业发展

李凤藻

清朝咸丰年间(1851-1861年)，吴忠地区只有一些小业主和摊贩、小手工业（五匠），尚没有正式的大商号。从光绪（1875-1908年）末年起，吴忠开始有了少量的铺面，并形成吴忠商业中心。主要有山西帮十余家客户，吴忠地区开设了“字号”，本文将概述自清朝光绪末年，吴忠商业的兴衰过程。

清光绪末年，吴忠地区先是由山西商人开设了几家铺面，分别是“自立忠”“自立长”“天心协”“自立兴”等。铺面中资金较大的“自立忠”约有五六千两白银，其他约有资金二三千两。本地人民国初年创办的商号，规模大点的商号，要算“天成和”（李姓）“福顺安”（马姓），约有资金三千多两白银；“万生财”（牛姓），“永兴隆”（白姓）有资金两千多两。当时这些商号也都从陕西、甘肃、包头等地进货，运些粗杂货供应人们的生活需用，也因交通不便发展非常缓慢。当时山西几家商号均因发展困难而在民国十年（1921年）前相继关门，就剩本地几家继续营业。

民国元年以后，何义江在灵武县崇兴寨开设“义顺生”，他的资金初开时有白银两千多两。此外还有“三义公”“谦益店”“万顺奎”“福生魁”“福兴奎”“广和隆”等商号，他们都是从运输业开始，起初往返于吴忠和外地间代客运货，用几头骡、马、驴做运输工具，后来改成骆驼运输，也能兼经营土特产品杂货业。自京包铁路通车后，吴忠的商业发展很快。

吴忠本地回族商人吃苦耐劳（与山西帮经营方式不同），掌柜自己出外下乡购销货物，遇事能自己判断决定交易，比雇人方便。所有这些本地商号都采取“四兼”（东家、采购、会计、运输兼于一身）的经营方式。较大的商号主要在甘、宁、青采购皮毛和药材，销往天津再换回这里需要的商品。当时在甘、宁、青一带很有些名气的商号都有自备骆驼自行运输，从吴忠到包头经过伊盟，昼夜兼程一个多月时间就往返一次，商品和资金的运转非常灵活。至抗战前的13年时间，吴忠地区（包括金积、灵武）能从外地进货的商户达30多家。据旧商会不完全统计，资金在20万白洋以上的有两家，“天成和”有流动资金20万元以上，还有包（头）绥（化）吴（忠）等地房产200多间、骆驼200余峰。“义顺源”（何义江）流动资金也在20万元以上，在天津、吴忠两地有房产180余间、骆驼百余峰等。此外资金15万元到25万元的有5家，即“福兴奎”“永昌隆”“宣德堂”“忠义荣”“庆盛奎”。资金在10万元至15万元的有“谦益店”“振兴水”（马五洲）“天益合”“福顺安”等。10万元以下的有10余家。此外还有1万元以下的不算正式会员，不出会费，商会未做统计。当时吴忠市场非常繁荣，人们称为“小上海”，有生意兴隆通四海之势。外地的商号纷纷来吴忠开设店铺，如中宁的“庆太恒”转到吴忠后改名为“永昌隆”，平凉的“明德合”也移到吴忠。据统计，开店铺的回民占70%，汉民占30%；本地占80%，外省占20%。

这些商号在抗战胜利后，大部分都倒闭了，剩下不多几家，资金不到半数。有些在抗战胜利后因躲避马鸿逵的残酷压榨，转移到天津做买卖去了，解放后才回到吴忠。

吴忠所开商号，大都是经过辛勤劳动和艰苦经营发展起来的。商业经营活动的范围因资金有限只能达到天津，没有能力向东南沿海一带发展，也没有大的资本家。若外部施以暴力摧残，它的衰败倒闭也就比较快。

吴忠商号倒闭的原因主要是马鸿逵的摧残压榨。统治宁夏17年的马鸿逵，对商业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派购军粮。每大户就补贴粮价达万元之多。如“天成和”一次就贴粮价9000多元，还有很多的零星补贴。摊派雇兵款。每大户都不下三四十名兵，“天成和”共雇兵42名。马鸿逵在吴忠商户中强征捐款甚多，强行压价搞所谓“统购”物资。凡有利可图的东西，都要由马鸿逵定价“统购”。就以商户库存的羊毛来说，原每百斤58元，马却以每百斤14元强行“统购”，使商人损失很多资金。税目繁重，公开敲诈勒索。马鸿逵视商户如案头肉盘中餐，随时都要吃喝。

抗战后不到几天，天津、包头就相继陷落，宁夏在此两地经商的人员纷纷返回，致使在该地库存的货物一部分被汉奸勾结日本人抢走。剩下一部分有棉布、纸烟等，在运回吴忠时，行至半路又被马鸿逵派军队抢走。

总的说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繁荣，但是社会制度又制约着商业的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许多民族资本家艰苦创业，希望实业救国，但大都在官僚、买办、帝国主义压迫下走上了一条失败的道路。而我国商业繁荣的时期正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到来的。

（作者简介：李凤藻（1894-1991），男，宁夏吴忠人，宁夏著名爱国工商业者，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宁夏政协第三、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孔广耀历经艰难志更坚

孔照恒

孔广耀，又名孔僧宜、孔静宇，宣统二年（1910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右旗沟门乡马留村的一个小农家庭。民国5年（1916年）在萨拉齐读私塾，民国9年（1920年）转入萨拉齐模范小学读书。归绥五族学院成立后，又同杨植林等同志考入五族学院师范部，在这里受到了共产党影响，参加了许多革命活动。民国15年（1926年）考入国民军在包头创立的军事政治学校，进一步接受革命教育，表现更为积极，由杜宗周、彭桂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天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初，受组织派遣，孔广耀与刘贯一、彭桂林一起护送从苏联归国的邓希贤（邓小平）、王涤亚、朱逸尘到西安。他们步行由银川出发，经灵武、吴忠、同心、固原、平凉等地到达西安，历时一个月，行程2000余里。途中，邓小平详尽地介绍了苏联的风土人情和地理概貌、十月革命前后社会及各阶层的情况，革命胜利之后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及其亲身感受。在向延安进发的途中，他们又调查了沿途各地人情风俗，生活状况，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播下了革命火种。

是年5月，孔广耀从国民联军政治学校毕业，分配到国民联军政治部前敌政治工作团，在时任政治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刘伯坚，政治部科长贾大容等领导下工作。不久，随军出潼关东征，与北伐军会师中原，在郑州受组织委派出任京汉铁路、陇海铁路工会指导员兼秘书。在陇海铁路郑州分会工作时，因从事革命宣传被国民党郑州党部委员酒成名等告发，由国民党军法处扣捕，押解到开封，以宣传共产主义、煽动罢工罪被判10个月徒刑。

1929年初出狱后，孔广耀到邓宝珊部做地下工作。1930年冬，同闫揆要等同志受西安中共地下党派遣，考入南京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九期）并兼做地下工作，后因蓝衣社监视，被蒋介石画圈准备枪决，经组织及时营救离校。

在追求革命的道路上，孔广耀矢志不移。1933年到达北京，和蔡子伟同志接上关系，被派到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任副团长，当时柯庆施同志是抗日同盟军军长。1934年初到国民党何遂部做兵运工作，策动200余名士兵到张家口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同盟军。3月，党组织又派他到宁夏工作，由于战争的原因，他只到达了陕坝。5月，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河北省党部诱捕。侦讯期间，他乘敌人不防备，在4日晚上7点多钟，手戴铐具，越墙而逃，不幸又被警方捕获。5日的《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对这件事都作了报道。

不久，他被解送南京宪兵司令部严办，以“参加反动集团抗日反蒋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37年获释，回到西安，经宣侠父介绍，到伊盟白海风的蒙旗独立旅担任参谋、团副等职，与当时担任政治部代主任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乌兰夫接上了关系。

1938年初，蒙旗独立旅改称新编三师，简称新三师。5月，新三师按照中央指示移驻伊克昭盟桃力民一带。孔广耀又及时与中共伊盟工委书记赵通儒接上了关系。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秘密在官兵中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及有关纲领、政策，积极培养和发展共产党员，并深入地方群众中组建了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等群众抗日组织及民兵、武工队等民间抗日武装。

从1940年初开始，日本侵略军调拨主要兵力，加紧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侵略归绥的日军多次出兵，妄图跨过黄河，占领伊克昭盟，进而向陕甘宁边区钳入。新三师奉命坚守达拉特旗的黄河沿岸地区。这时的孔广耀已经当上了副团长，他身先士卒，深入前沿率领部队顽强战斗，英勇杀敌，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有力地保卫了伊克昭盟和陕甘宁边区的安宁。1941年春天，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已经暴露身份的乌兰夫等中共党员离开新三师回了延安，孔广耀等未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仍然留在新三师，继续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

1946年，孔广耀与黄风奉命到武都等地接领新兵，与地方人士发生纠纷，被告到上级部门，被羁押了6个月，1947年12月恢复自由。

1949年5月，孔广耀又到了甘肃岷县做兵运工作。8月，当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天水、兰州等地后，集结于岷县的国民党军队，有的主张起义，有的主张南下，有的动摇犹豫。当时，孔广耀相机行事，利用同学关系，竭力说服骑兵大队长李树举、173师参谋长吴葆锟、保二团团长张令仁等，率部于9月11日起义。

全国解放后，孔广耀转业到宁夏，先后在吴忠自治州、宁夏水利电力系统工作。1977年9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常委。1982年离休。1984年11月，经中央组织部批准，享受副省级生活待遇。1987年6月1日于银川逝世，终年78岁。

孔广耀同志60多年的光辉革命历程，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经历，经历了解放前、解放后种种苦难和迫害，但共产党员的伟大理想、信念从没有湮灭。孔广耀同志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他去世时，杨植林同志（原甘肃省委书记）不顾八十岁高龄，专程从兰州到银川参加治丧活动，并为孔广耀同志写诗为悼：“六十余年映眼帘，荆棘道路伴生前。舍身不顾风云变，练就丹心志更坚。立马横戈冲塞外，飞骑进击致中原。革命忠贞知平素，哭祭英灵好自眠”。

（作者系孔广耀之子）